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陈 宁 生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为了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组党热潮风靡一时。它们试图通过竞选,谋取议会多数席位,组成政党内阁,把欧美式的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中来。由于封建军阀势力总代表袁世凯的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喧嚣一时的政党政治以失败而告吹。本文拟从民国初年中国国情出发,来论证政党政治未能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一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体制上,它规定采用内阁制,根据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确定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它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具体化,从而推动了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竞相进行组党活动。据统计,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到1914年1月第一届国会解散为止,全国政治性质的“会”、“社”、“党”,可谓“总总林林,相此而立”^①,多达312个。重要的有中国同盟会及其改组的国民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等等。这些政党按其政治倾向,可以划分为“反袁”的革命派(或称激进派)和“拥袁”的立宪派(或称保守派)。它们以北京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为舞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演了一场走马灯式的政党政治角逐戏。

在北京参议院的120个议席中,共和党占40余席,同盟会仍维持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的30余席。统一共和党占有20多个席位,在议会的角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盟会出台组阁的目标是实现《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完全责任内阁制,以便制约袁世凯总统的权力。因此,同盟会阁员全力支持唐绍仪内阁,并吸收唐加入同盟会,时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不久被袁世凯挤垮。究其原因,同盟会认为“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也”^②,于是决定“绝对主张政党内阁”,否则“无以祛政治进行之障碍”^③。

同盟会“政党内阁”论一出台,当即遭到袁世凯的反对。袁的理由是中国“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才。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④。共和党人熊希龄为迎合袁世凯,遂提出组织超然内阁的主张。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无党派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国务院总理,组成所谓“超然内阁”。当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组阁案后,同盟会4阁员遂联袂呈请辞职以

示抗议。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俨然以仲裁人的姿态出面调和党争，发布通令要求，“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⑤，并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份内阁阁员补充名单，因遭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议员的反对而未获通过。于是，袁世凯决定动用军警压迫各党议员就范，授意内务总长赵秉钧召集北京军警联合会特别会议，通电攻击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安危。一时间，各类攻击性的传单布满京城，有的传单点名攻击统一共和党吴景濂（参议院正议长）、谷钟秀（参议院委员长），甚至以“取得吴、谷两人头颅者，赏洋一万元”相恫吓；另有署名为“健公十人团”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议员，言若再不牺牲党见者，将以炸弹从事”^⑥。与此同时，共和党人也狐假虎威，摇旗呐喊，通电全国，指责同盟会，声称：“目前党派分歧，基础均未稳固，无论何党，苟以纯粹一党握有政权，易招反动”，“此次阁员名单……本党参议员意见一致”，而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予以否决，是有意“使民国一时陷于无政府状态”^⑦。1912年7月26日，参议院对袁世凯第二次提出的一份内阁名单进行表决。当天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一群腰间配带武器的纠纠武夫，杀气腾腾地扬言：“他们若不要国家，我们就不要法律！”统一共和党议员除谷钟秀外都怯生生地投了赞成票。新提出的阁员补充名单遂获得通过。陆征祥内阁总算在经过几番折腾后勉强组成。时人讥讽新内阁既非超然，又非政党混合内阁，“倒玉成了一个完全总统内阁”^⑧。

陆征祥内阁的组成，标志着同盟会为争取组织政党内阁的斗争，首战失利。宋教仁认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党势不强，因此当务之急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他决定“以政党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然后再以多数党的地位控制国会，组成政党内阁。他仍坚持“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⑨。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成国民党。孙中山亲临主持成立大会，他深信“今日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⑩。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仍委任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在它发表的《宣言》中，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政党政治”的主张。《国民党宣言》^⑪指出：“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事实上之政党也”，因此政党应视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它还指出，政党政治“是共和立宪国家政治运行的常轨，因为政党‘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轡响。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已处于监督之地位，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国民党的成立，扭转了同盟会在参议院中处于劣势的局面。同时，由于统一共和党合并于国民党，参议院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第三党已不复存在。此时，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力谋合组民主党。1912年9月27日，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俱进会、国民新政社、国民协进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等6政团联合组成民主党。由于参加民主党的各小党在政治上基本上属拥袁派，所以民主党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党势发展很快，“足与国民、共和两大党抗衡，成鼎足而立的形势”^⑫。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自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临时大总统将召集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大总统。又根据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组织法》规定，国会将仿照美国国会，实行参

议院、众议院两院制。为此，从1912年12月开始，在全国各省区展开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选举国会议员的活动。

为了争夺国会议席，各党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角逐。宋教仁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⑬。袁世凯用金钱拉拢共和党和民主党，企图造成一个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政党。袁向梁启超许诺，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将资助20万大洋。这两个党自恃有袁提供的经费作后盾，使尽混身解数，满以为能在竞选中稳操胜券。然而，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竟获得优胜。据统计，在国会众议院议员596席中，国民党得269席，占45.2%；共和党120席、统一党18席、民主党16席，三党合计154席，仅占25.8%。在参议院议员274席中，国民党得123席，占44.8%；共和党55席、统一党6席、民主党8席，三党合计69席，占25.2%。总计参、众两院议员870席，其中国民党得392席，占45%；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223席，占25.5%。其余议席为跨党议员（185席）、无党派议员（70席）所占据。^⑭

国民党人对于竞选的胜利无不欢欣鼓舞。宋教仁更是志得意满，以为“国民党在全国选举的胜利，已占国会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⑮。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春风满面，准备离沪北上组阁时，不幸被袁世凯收买的刺客击中，死于非命。这位忠诚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政治活动家，壮志未酬身先死，为共和主义献出了宝贵生命。

宋教仁的血预示着国民党苦心孕育的政党内阁制胎死腹中。但是，多数国民党人仍幻想通过该党在国会中拥有的多数，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国民党议员以多数席位雄踞议坛。此时，共和、民主、统一等三党，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合并为“健全之大党”同国民党作“公正之党争”，使“彼自归于劣败”^⑯。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在北京正式成立。至此，国会中两大对立政党始告形成。

1913年10月，袁世凯驱使御用的公民党在国会内部，调派军警力量在国会外部，采取内逼外堵的恶劣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随后，袁步步紧逼，蓄意解散国会。首先，他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赋予大总统的各项权力不应附带任何限制，即不必经过国会之同意或提交参议院议决。当此案受到国会宪法起草委员的抵制后，袁就给国会加上了一条“国会专制”的罪名，并拿国民党开刀。同年，10月25日袁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之文武官吏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⑰11月4日，袁世凯发布了经内阁总理进步党人熊希龄副署的命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勒令其解散，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

对于国民党议员之被驱逐，非国民党议员普遍存在有兔死狗烹之虞，他们呼吁：“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通义”^⑱。而熊希龄竟为袁的违法行径辩解，他在给众议院院长王家襄、汤化龙的信上振振有词地说：“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以执常例以相绳”^⑲。进步党人熊希龄充分利用内阁总理的副署权，辅佐袁记总统“治国安邦”。果然，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终于发布了经过熊希龄内阁副署的解散国会令，接着又发布解散各省议会令。至此，民初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国会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民党和进步党的政党政治理想均宣告破灭。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为什么未获得成功呢？毛泽东早已作出了答案：“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②0}。就是说，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任，因而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就自然不具备建立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各种条件。

第一、政党内阁制，是资产阶级专政下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形式，只有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及其统治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后，才有可能逐步实现。民国初年，国家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封建军阀袁世凯手中，其政权性质也没有改变。因此，这与英国立宪君主制下的政党内阁制度大相径庭，英王已由实君转化为象征性的虚君，由多数党领袖为首相的政府是握有实权的全国政治中枢。但民初国家权力中心并不在内阁，政治首脑不是国务院总理而是总统。当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后，革命党人为了牵制其权力才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看来为时已晚了。袁世凯基于封建保守派的本性与个人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打算受制于《临时约法》关于总统和国务院权限的章法。当临时政府北迁后，中央政府的政治重心从来就不在内阁而在总统府。前述唐绍仪内阁的倒台、陆征祥内阁的接班，都充分说明内阁实际上并非由参议院产生，也不是由国会多数党领袖组织，而完全是由袁世凯个人定夺。结果，资产阶级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党内阁制全都变了种，不是“总统内阁”，就是“内阁政党”，或是混合内阁。民初的所谓内阁其实并非中华民国内阁，而是袁世凯的秘书院。

同时，政党政治有赖于健全的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的原则来实现。《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规定由国会选举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国民党人在“宋案”发生后，也曾寄希望于国会制定出一部宪法，以确立完全的政党责任内阁制。然而，袁世凯凭借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以行政权干预国会立法权，在利用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后，即恣意破坏三权分立原则，解散国会，实行独裁统治。

第二、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具备独立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政党政治的条件。

其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薄弱，决定了代表这一阶级的政党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国民党抛弃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民族主义变成了“厉行种族同化”；民权主义变成了“发展地方自治”；民生主义变成了“采用民生政策”。恩格斯曾指出：“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②1}，既然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时期的进步主张，这就削弱了它的群众基础，使它变成了单纯从事于议会活动的政党。

国民党的软弱还表现在它严重地脱离群众。列宁在1913年4月就指出：“国民党的‘弱点就是它还没有能充分地把中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尤其是‘中国并没有普选权！’”^{②2}而没有普选权，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治就失去了根基。

虽然《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之权，但是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又对选民资格规定了性别、年龄、财产、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年限等种种限制。这就使中国妇女和一般贫苦大众被排斥在选举之外，甚至使相当一部分无田产或未达到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工商资产者也没有选举权。结果，第一届国会选举时，各省登记的选民共有

4000万，只占总人口4亿的9.98%^{②4}，这中间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浮报和滥报成份。可见《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②5}”，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既然中国没有普选权，所谓国会议员的选举也就失去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同时，即使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由于受到封闭型自然经济的限制，他们的参政意识也是很有限的。许多选民对选举并不感兴趣，选举开始时，弃权者不少。即使象上海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参加选举众议员的也只占登记选民人数的1/4。各党为了拉选票，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例如民主党“在发给选票时，每一初选人附送一券，上写凭券发米粉若干碗，如未使用或使用不完的数量，得按值换取现金；另组织捐客，包办选票，一人可领十余票或数十票。国民党亦不得不使用此类方法，否则无人投票^{②6}。”

当时资产阶级各个政党的活动也是脱离群众的，它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咫尺之参议院中”。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辛辣地批评说：“政党最大责任，又在于国民的运动”，然而那些名目繁多的政党“而发表政见焉，讲求政略焉，驰骋于议场，发揭于报纸，而大政党之名洋洋盈耳矣。究竟于吾沉沉古国复杂隐密之社会，有何种之影响，于吾沉吟憔悴，坐待奴亡，呼吁不闻，救死不暇之中下级人民有何等相关之休戚^{②7}！”正因为资产阶级政党提不出也解决不了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所以一般群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犹风马牛不相及^{②8}”，漠不关心。当袁世凯解散国会，驱散国会议员时，“平民翻为旁观热闹之闲人^{②9}。”

列宁指出：“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和坚定不屈的先进阶级，共和国是不能巩固的^{③0}。”列宁的论断完全符合民初中国国情。

其二，国民党领袖当时还提不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党政治理论，去指导国民党人的行动。

虽然，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政党政治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探索，他们对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党斗争应遵循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的原则；以及在中国必须坚持建立“政党内阁”的政治体制等问题上都达到了共识，但却存在严重的缺陷。

在建党思想上，否认政党的阶级性，推行了一条兼容并包的组织路线。国民党成立之初，为了造成一个完全的国民党内阁，甚至把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及其阁员拉进党内，而这些人毫无政党意识，把入党当成儿戏。赵秉钧曾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③1}”难怪当时记者讽刺赵秉钧内阁：“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谓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③2}。”宋教仁为把国民党造成为国内第一大党，在选举中争胜，公开号召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为标准，这就造成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莸同器，良莠不齐^{③3}。”造成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奉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傀儡，党员有类于散沙^{③4}。”总之，国民党已蜕化成一个组织松散的新旧势力杂揉的混合体，其作为一个先进政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都大大削弱了。

在政党斗争方式上，国民党领导人几乎都否认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民国建立，即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再不能象同盟会时期搞武装斗争，只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宋教仁强调：“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③5}。”他们看不到国

民党的对手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的、并有西方帝国主义银行团为经济后盾的强大的北洋军阀集团。列宁当时就指出：袁世凯“违反国会的意愿”，签订了向欧洲资产阶级贷款的“债约”，并由此使欧洲资产阶级“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同这个联盟作斗争，对于孙中山的党来说，是很不容易的^③。”然而，国民党人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为了实现政党内阁制，几乎倾全力于国会选举活动，他们过分相信通过国会选举，能够纳民国政治于正轨，从而放松了对袁世凯的警惕。当“宋案”发生，国民党人仍迷信“法律”解决，以致孙中山发出“非去袁不可”，“武力倒袁”的号召，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第三、政党内阁制的建立，需要参与竞争组阁的两党遵循平等竞争的原则。这个原则由于“党同伐异”观念的影响，并未付诸实行。资产阶级各政党间的党争也未完全脱离封建时代“朋党”之争的窠臼。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成了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联系较强和较弱的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代表这两个不同阶层的政党，即立宪派政党和革命派政党，从它们一产生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虽然按阶级属性，两派政党都是正在前进的阶级力量。它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共同的敌人。但是在革命时期，由于它们在共同的主要敌人满清封建王朝没有打倒之前，就分裂成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彼此互相牵制，其结果使独夫民贼袁世凯坐收渔利，革命党和立宪党都被挤到政治舞台的偏僻角落。民国成立后，这两大对立的党派本应为实现政党内阁制的共同理想携手合作，求同存异，公平竞争。然而两派又因政治倾向和政治手段的不同而分成了势不两立的拥袁派和反袁派。两派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发展到意气之争。它们彼此攻讦，挥拳舞棒，互相斗殴，从而败坏了政党的声誉。时人指责道，各个政党对“政府之监督，政务之调查，政策之研究，非所急也，惟是以诟詈斗殴钻营为务”，它们“各据旗帜，奋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国乃骚然内讧，以坐待他人之宰割”，结果“覆巢之下无完卵，栋折榱崩，同归于尽^④。”事实确实如此，政党间严重的对立正好被袁所操纵。如前所述，国民党和进步党无论其目的是夺袁之权，还是分袁之权，均未如愿以偿，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总之，在中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权性质没有改变之前，企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失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革命党为了争取和实现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所进行的建立政党政治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一实践活动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一种必要方式，对于遏制袁世凯专制独裁野心，传播民主共和思想，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所进行的斗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他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但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仍然作出了许多贡献”；“不管那些以国内反动势力为靠山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但是这个党的工作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⑤。”孙中山正是从总结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必须坚持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建设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中，孙中山确立了新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实现了国共首次合作，为发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 ① 邵元冲：《政党泛论》，《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
- ② 戴天仇：《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民权报》，1912年5月。见《近代稗海》第6辑，第179页。
- ③ 《同盟会之宣言》，《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日。
- ④ 《爱国报》1912年6月20日。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14页。
- ⑤ 《政府公报》，民国元年七月。
- ⑥ 黄远庸：《三日观天记》，《远生遗著》第2卷第76页。
- ⑦ 《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8月。
- ⑧ 《大公报》1912年7月30日。
- ⑨⑩⑪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63页、456页。
- ⑩⑪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0页、第396—39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 ⑫ 印维廉编：《中国政党史》，见《革命文献》（台北）第41辑，第210页。
- ⑭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61页，商务印书馆。
- ⑮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⑯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
- ⑰ 《袁世凯通电》1913年10月25日，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⑱ 《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见《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8页。
- ⑲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9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 ⑳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8页。
- 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4页。
- ㉒③④⑤⑥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1913年4月28日），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 ㉓ 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 ㉔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7页。
- ㉕ 魏继昌：《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70页。
- ㉖②③ 《铸党论》，《远生遗著》第2卷。第100页、第101页。
- ㉗ 《民国日报》，1916年8月28日。
- ㉘③④ 黄远庸：《政谈窃听录》，《远生遗著》，第155页、第153页。
- ㉙ 《陈其美致黄兴书》，见《黄兴集》第4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㉚ 《总理致南洋同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264页。
- ㉛ 黄远庸：《三党合并论》，《远生遗著》卷一，第4—5页。